

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



• 吴敬琏 科尔奈等 著 • 韦森 主编

红旗出版社

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

| 韦森 主编 |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 / 韦森主编.

—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051-1999-4

I. ①节… II. ①韦…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8766 号

书 名 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
主 编 韦 森

出 品 人	高海浩	责任编辑	竺大文(hqnfzdw@126.com)
总 监 制	鲁 强	特约审稿	赵力行 邓 巍
封面设计	未设计(wesign)	封面摄影	朱蓉蓉
责任校对	胡亦潇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南方中心)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 邮编 310039
邮政编码 100727 编辑部 0571-85310467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行部 010-64037154
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北京)010-84026619
(杭州)0571-85310467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3 千字	印张:20.75
版 次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1-1999-4 定价:39.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韦 森

2011年是中国人世后的第10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到了一个节骨眼上，因而需要梳理一下我们的思想，为未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做些理论准备。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的1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中国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体系的？中国的人世又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已经高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在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这些已变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各界乃至世界诸多人士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当下，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才刚刚过去，全球金融风暴已经是“雨过”，但似乎仍然还没“天晴”。无就业的复苏，还像噩梦一样困扰着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

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是如何发生的？是否是市场经济本身所秉有的毛病复发了？在一个市场经济初成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强势

政府的全面进入和干预，导致了中国经济仍然在世界经济大衰退中有8%以上的GDP增速，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失效和干预主义的合理？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什么结果？这些都是今天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刚过去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实在是考验了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也给一些长期怀疑市场并对计划体制怀旧的人士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弹冠相庆的机会。然而，对于大多数思想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市场本身会出错，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我们应当以法治化的监管和调控来促进市场的公正和有效率的运转，而非以政府监管、调控乃至强势进入来替代市场本身。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所要吸取的教训，不是“市场失效”了，而是如何运用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对于过去中国所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的数据和事实，今天可能无人能再否认了。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社会大转型中积累下来和正在不断积累的问题，大概也是任何人不能回避得了的。

此时，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辩，恰如其时地出现了。这本集子收录了诸多重量级学者的各种观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中国的事实和思路。

从某种程度上看，很多方面犹如吴敬琏老师所喜欢引用的《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一个方向。”

法治民主政制下的良序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中国须得选择，世界在等待着中国的选择。

目录

1 **第一章 历史：利弊的反思**

3 吴敬琏观点 矛盾源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

47 罗斯基观点 临时创新填补了制度的空白

中国最近的经验证实了我们的经济命运不是注定的这一信念。涉及激励、流动、价格、竞争和开放的大型改革，虽然仍有许多不足，却促进了经济增长。

75 **第二章 增长：奇迹或幻像**

77 秦晓观点 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

判定好与坏的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82 附录：李泽厚、秦晓对话录

93 韦森观点 吃尽了引入市场经济的“红利”

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不同，在转型的中国社会中，政府是放出了市场，引入了市场，并常常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法强势地参与并驾驭市场。

103 华生观点 国企缩小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许多人认为国企的存在造成了垄断、寻租和特权，认为把国企取消、国资分完了就好了。但如果私有化真扩大到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些央企头

上，那中国就一定是权贵资本主义了。那时，官商勾结乃至官商一体、公权私用就会真正普遍化、主流化。

111 田国强观点 中国改革成功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所以难逃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满足参与性和激励相容这两个约束条件，不能很好地解决个人理性和可实施这两个必要条件，而邓小平深刻地理解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自始至终把握住了这个关系。

123 科斯观点 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

中国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但当人们提出并讨论不同的理念时，更好的理念就会脱颖而出。再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我们就能鉴别其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

129 科尔奈观点 当前一代为未来一代做出巨大牺牲

我们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当前一代正在为未来一代做出巨大牺牲。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划分问题是可行的，历史上也有人采用过，但其他路径也是可行的。

139 第三章 体制：复杂的互动

141 陈志武观点 市场经济铸就通向个人自由之道路

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还要“重建孔家店”。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GD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权利和尊严。

161 姚洋观点 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

我总结了四个要素，它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

179 袁伟时观点 稳定和自由是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统治型的管理体制早就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与公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差距。面对社会矛盾尖锐的时代，只有民主和法治能及时妥善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否定这个领域的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185 附录：“中国模式”再审视

191 萧功秦观点 威权式调控与效率至上产生了特殊优势

要形成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强势组织力量，对于很多后发展国家来说是很向往的，但却是很不容易的，而中国恰恰通过政府的全能主义向市场竞争体制的软着陆，建立起一种既有强势国家，又有充满活力的企业的社会经济领域的这种结构。

209 希尔顿·鲁特观点 中国资本梦徘徊在市场和权力间

中国将面临最终的根本性议题：为稳定税收和实现消费，政府权力的边界何在？这个问题在短期可以被忽略，因为政府具有不受限制的资金借贷能力。但为了应对未来的不可预见性，中央政府应该审视它同地方、公司和个人间的税务关系以拓展税基。

233 第四章 比较：规避的方向

235 黄亚生观点 东亚模式胜过拉美模式

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东亚模式是真正经济成功的模式，拉美模式则是经济失败的模式。

240 附录：龙象之争：另一个视角看印度

245 科尔奈观点 东欧建立保护型政府的呼声越来越强

东欧的管理者迟早会感受到宏观经济变化带来的压力，他们会为自己在“平等”、“博爱”精神感召下的慷慨支出付出惨痛的代价：预算赤字、债务占

GDP的比率攀升、失控的经常性账户赤字、投资者无意购买政府债券，等等。

267 彼得·希夫观点 中国有着更大的经济自由

中国人不能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他们一直在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来养活美国。当前这种关系解体后，中国就可以甩掉美国这个沉重的包袱。这可能对某些个别群体不利，但对大部分中国人绝对是件好事。

287 第五章 预言：高速的未来

289 帕金斯观点 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素还将快速增加

没有确切的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将不能保持目前这样的高增长；但同样明显的是，还有许多未知的因素，可能会在一定时期里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中国能否较快地建立高效的市场制度，以应付经济高速增长所需。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保守估计是：其年均增长率将不会超过8%。

303 张维迎观点 人口大国将重返经济大国

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50年、100年之后，人类可能又回归到19世纪之前的状态，即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相当，人口大国也是经济大国。当今世界，除了中国，印度人口最多，亚洲人口占世界的近60%。所谓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也就是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关系的回归。

第一章 | 历史：利弊的反思

吴敬琏、罗斯基，中西两位顶级学者在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以各自独特的角度回顾和思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显然，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在寻找下一步方向时，历史，是他们思考的起点。

这是两篇在某种意义上彼此呼应的文章。吴敬琏从历史中得出结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矛盾的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罗斯基认为，30年的改革将中国经济塑造成一个混合体。这个混合体里尽管有一些部分，比如资本市场和投资支出留有计划的后遗症，但总的来说，它对国内外的市场反应越来越灵敏。

吴敬琏观点

矛盾源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等。

两种对立的解决方案

当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

由于双轨并行的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

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对这种情势的原因，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判断，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另一部分人把腐败蔓延、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他们认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两极分化和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主流媒体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原因和应对措施的阐述加强了这种思想倾向。于是，有些人把希望寄托于恢复国有企业的统治地位以及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状况。

在这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大众对于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玩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

迷惑大众，把反对和打击的目标从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团转移到在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一般“富人”，甚至包括中产阶层身上。他们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动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在政治上，则要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七八年再来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做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

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

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原来实行的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干部身上，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作出了框架性的设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一设计也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

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我

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的经济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变革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以及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措施以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思路为背景，往往方向各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为了简化头绪、深入讨论，本文以主要的改革措施为标志，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进而解析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之路。

第一阶段是1958年至1978年，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93年，为增量改革阶段，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以外的经济领域中推进，并以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来支撑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至今，为整体推进阶段，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进行全面改革。

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

1958年至1978年：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

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央计划经济得以全面推动，并在初期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其弊端也很快就显现出来。整个国民经济就像是一个“大企业”，中央政府是企业领导，各级地方政府是企业的各级部门，本该作为独立经营主体的企业，类似于这个“大企业”中大大小小的车间。

在这个“大企业”中，中央政府制定目标，通过计划指令层层下达至各级“部门”，然后由各级“部门”下达给各生产“车间”。这是一个无比庞杂、自上而下集体行动的体系，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其计划异常复杂而难以精准，且缺乏调整的弹性。整个国民经济看似有序，却难免陷入低效甚至僵化的境地。

当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拖经济的后腿时，中国政府试图加以调整。不过，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认识水平，这个阶段的种种调整不过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许多措施又往往容易变形走样，甚至走向更为错误的方向。

此后的实践证明，建立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的改良，无法根除其弊端。相反，由于严禁分权决策下微观主体的必要尝试，计划经济体制每一次政策的调整，都意味着少数精英带领整个社会都经历一次震荡，其间缺乏应有的缓冲和弹性。

“体制下放”

这一阶段，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这是对计划体制的第一次修补，类似于“大企业”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向各级“部门”下放自主经营权，也增加了“部门”之间的竞争，但其本质不变，仍然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企业，主要靠行政命令进行运作，而不是依靠价格信号来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其有效程度极端依赖事前计划的周密度和精准度——而缺失价格信号作为客观标准，对主观计划的优劣无从作出合理评判。计划本身的问题，执行能力的问题，执行者的动机问题，都可能造成各种无法度量的低效、浪费和损失。

1957年，中国政府根据1956年8月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决定，制定了以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从1958年初开始了“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还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改组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由“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经济体制，成为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

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向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群众放权让利的原意不完全符合，后面两种放权让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原因主要是1957—1958年国内政治事态发生变化，从而使向国有企业和职工放权让利